

#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着力点

■ 冯颜利 柳星宇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逆流涌动,国际经济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前段时间,美国罔顾世贸组织规则,悍然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打着“公平”的旗号行贸易霸凌之实,扰乱全球供应链,冲击多边贸易体系,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中国第一时间亮明立场,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重申始终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浙江以平台提能级、枢纽建强、模式创新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持续增强大宗商品配置、全球资源链接与国际市场拓展能力,奋力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当前,全省上下正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注入澎湃动力。

## 把开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浙江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坚持把开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以拓展新路径、新模式、新业态为抓手,加快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浙江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巩固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深耕“一带一路”、东盟等新兴市场;推动“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行动,打响“浙江国际贸易展览会”品牌;大力发展中间品、绿色、离岸等新型贸易形态,积极布局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新赛道,“浙江服务”“浙江智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杭州“中国数谷”、宁波数创港、温州数安港等数字贸易平台蓬勃发展,跨境电商综试区全面提升,全球跨境电商直播新高地加速崛起。实践证明,浙江之“先”,不仅体现在起步早、布局快,更体现在敢于创新、善于突破,以自身的率先作为,为全国开放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浙江考察调研,为新时代浙江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他强调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要求浙江以重点领域改革为牵引,全面推进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浙江深化对外开放明确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赋予了浙江更重的使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

高能级开放强省,是浙江牢记总书记殷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实际行动和重大举措,要坚持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向,系统提升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切实增强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浙江在国家开放版图中地位举足轻重。走在前、作示范,是浙江发展的优势所在、责任所在,更是使命所在。勇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既是浙江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现实路径,更是为全国打造制度型开放样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支撑的必然选择。在新征程上,浙江唯有继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才能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勇立潮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 以开放型经济塑造发展新优势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际竞争格局重塑,浙江以制度型开放、要素高效配置为着力点,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加快形成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内外循环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浙江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基础。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金钥匙”,制度型开放已成为引领改革突破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重点领域,浙江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不断提升规则适配度与制度兼容性,在大宗商品储运、跨境数据流动、非外汇结算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形成了一批具有引领性的“浙江样本”。从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의破题开路,到自贸试验区能级跃升的纵深推进,再到“数字综保”新业态的加快布局,制度创新正不断拓展空间、丰富内容。通过以制度之“桥”畅通资源要素之流、以制度之“舵”引领高质量发展之航,制度型开放的深化不仅增强了应对外部风险的韧性,也为构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浙江统筹推进开放要素高效配置,持续完善流通体系和开放平台布局,推动形成全链条、系统化的资源配置能力。开放不仅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向问题,更是“通起来”“转起来”的系统工程。浙江着眼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主骨架,立足“硬件”建设,全面推进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建设。宁波舟山港锚定世界一流强港目标,金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提速扩能,嘉兴、义乌等空港枢纽协同布局,“海陆空铁”织就四通八达的开放经脉。同时,借助“浙江e港通”、全球数字贸易中心、“四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等“软件”支撑,打造连接线上线下、贯

通境内境外的数字贸易“云网”,持续提升外贸链条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统筹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内贸与外贸、开放与安全,在这场全要素、全链条的联动布局中,浙江不仅跑出了“加速度”,也激活了开放型经济的新引擎,不断增强全局配置资源的能力与全球链接市场的韧性。

制度牵引与要素协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局型的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浙江正努力将制度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全局联动优势,构建更具活力、更有张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径、贡献力量。

##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着力点

奋力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是浙江在新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条由“体制确立”到“功能强化”再到“地位稳固”的战略跃升路径,是浙江从“先行区”走向“引领者”的系统性跨越。要实现这一战略跃升,必须在关键领域率先破题、重点发力,推动高水平开放在机制设计、平台支撑与国际布局上实现全方位跃升。面向新阶段新任务,必须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基础上,打好制度对接、平台建设与全球链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组合拳,推动开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能级开放强省。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标准规则对接。高水平开放的根本在制度,关键在规则。浙江应立足自贸试验区、义乌国际商贸城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率先落实CPTPP、DE-PA等协定中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条款,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跨境数据流通”“绿色低碳准则”等新兴领域先行先试,打造中国制度型开放的“首发区”。同时探索设立规则对接先行区,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试行负面清单外全面准入、国际商事仲裁、跨境税务协同等制度创新。这种不依赖双边谈判、不等待多边共识的改革路径,将有助于浙江在制度层面建立与国际社会的非对称链接,提升规则适配力与议价能力。谁掌握规则制定权,谁就掌握未来竞争主动权。浙江要以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系统思维,推动从“规则适应”向“规则塑造”跃升,不断提升制度型开放的自主性和前瞻性。此外,也要注重制度创新与产业实践的协同联动,推动规则红利向发展红利加快转化。在数字贸易、绿色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要加强地方与中央、政府与市场、标准与实务的多元互动,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制度性成果,真正使“浙江样本”成为制度型开放的有效路径和鲜明标识。

二是以平台集聚构建开放要素磁场。要素配置效率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浙江应以世界级平台建设为牵引,打造高能级全球资源汇聚中心。宁波舟山港作为全球前三大港口,已具备大宗商品定价与航运金融功能,要进一步对接国际贸易平台、完善交易机制,建设国际油气、粮食、矿产等商品定价中心,提升全球配置能力。同时,以杭州、义乌、嘉兴等为支点,加快建设数字贸易港、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跨境电商高地,打造贯通“空海陆网”的“四港联动”枢纽体系,形成内外联通、要素流畅、链条完整的集成化开放结构。更要强化制度软实力,完善人才签证便利、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监管等配套制度,构建透明、高效、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从全球经验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本质在于高效集聚并配置跨国资本、技术与人才等核心要素,其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制度集成力与创新承载力上。浙江打造要素磁场,关键在于以平台为载体构建全球资源流动的“强引力场”。要素集聚不仅依赖物理通道,更依赖制度供给与生态营造。浙江应统筹“硬平台”与“软支撑”,构建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与创新生态的综合开放体系,推动平台从“要素汇集地”升级为“全球价值链节点”,不断增强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链接力与主导权。

三是以精准策略拓展国际纵深。高水平开放要着眼于“怎么开放、向谁开放、开放什么”。浙江应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下,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国际开放布局,优先深化与“一带一路”“RCEP”“金砖+”国家的制度衔接与市场互通。对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可在关税减免、贸易便利、技术合作、人才引进等方面实施主动开放政策,构建“新型全球南方伙伴圈”,以多元化市场拓展缓解外部冲击传导风险。在中美关系复杂演变背景下,浙江要推动“多点外交”,通过地方对话、产业合作、智库交流等方式,与美国产业界、科技界等利益相关群体保持良性互动,稳住中美经贸基本盘,增强对冲不确定性的能力。同时,还可探索设立“外资落地快速通道”“数字通商先行区”等机制化创新平台,围绕重点行业、重点国别精准推进,提升开放政策的定向性、协同性与灵活性。必须认识到,开放不是“一刀切”的模板复制,而是一种具备选择性、可调节性的战略性资源配置方式。浙江要通过场景化设定与机制化运作,打造可持续复制的对外合作模式,实现“以点带面、以小博大”的高杠杆撬动,持续拓展全球“朋友圈”,切实提升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识别度、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专家观点

■ 张海峰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在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同时,也给就业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加强对人本身的投资,既是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就业市场失衡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 理性认识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双刃剑效应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最早系统阐述了“技术性失业”问题。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专章论述了机器使用与劳动者福利的关系,指出机器虽能显著提高社会生产率,却可能导致部分劳动者被边缘化,引发“技术性失业”,恶化他们的福利状况。此后两百余年来,技术变革的就业效应始终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研究更多聚焦于自动化、信息技术和工业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格局。概括来看,偏向性技术变革理论是较为主流的分析框架,具体又包括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理论和任务偏向性技术变革理论。两种理论都认为,技术变革一方面通过“就业替代效应”或“就业挤出效应”减少部分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也会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和“技能-技术互补效应”催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乃至新的职业,即“就业创造效应”或“就业补偿效应”,因而,从理论上看,技术变革对劳动需求总量的净效应尚无定论。同时,技术变革的偏向性意味着技术变革驱动的发展红利一般不会自动地使所有人均等受益,进而导致收入分配效应。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必将如以往的重大技术变革一样,深刻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格局。作为影响范围更广、智能化程度更高、迭代速度更快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冲击将更加深远、更加复杂。

《科学》杂志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美国,约80%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中至少10%的工作任务可由人工智能完成,约19%的劳动者则有超过一半的工作任务可由人工智能完成。在中国,根据我们于202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有接近半数的受访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或生成式人工智能。尽管目前人工智能能替代的工作任务仅占小部分,但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演进,其影响范围和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变革主要影响重复性体力劳动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对重复性脑力劳动的影响似乎更大,对体力劳动和非重复性脑力劳动(如沟通协调)的影响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的职业和工作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已发布6批共计93个新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相关。

人工智能对各类劳动者的异质性影响在重塑就业结构的同时,也加剧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乐观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可降低某些工作的技能门槛,有助于缩小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就业和分配格局。悲观主义则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新的分化风险,同时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向下兼容性,若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和再培训,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 四方面入手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挑战

可以预见,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对知识和技能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不能及时更新调整,就业替代风险将会提高,技能供求失衡、就业压力和收入差距等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或将更加凸显、更加尖锐。因此,在人工智能加速演进背景下,必须更加注重对人本身的投资,把“投资于人”作为应对技术变革、促进人机协同、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根本之策。一是要健全协同育人机制,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自控力、自主性、人际沟通等非认知能力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也是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的独特优势。要引导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塑造,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

二是要深化教育体系改革,着力塑造创造性思维。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类智能的核心特征。要加快改革以考试为主的评价选拔机制,优化高校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更加注重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的潜能和活力。

三是要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升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加快了劳动力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的“折旧”。要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的劳动者提供灵活、多元、精准的技能提升路径,增强其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

四是要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增强弱势群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灵活就业人员和新业态从业者规模或将不断扩大。要加快构建与灵活用工和自由职业相适应的就业保障机制,增强劳动者抵御就业风险的能力,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实践探索

# 织牢特殊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

■ 王光净

心理健康不仅是特殊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石,更是其享有尊严、有价值人生的内在支撑。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以党建工作为灯,把握“残健融合 协同共培”的育人特点,多措并举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持续照亮更多特殊学子走向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未来之路。

实现分层分类内容供给。学院结合残疾学生的身心特点和专业特长,分层分类供给内容。组织大一新生线上线下“同上红船边的一堂思政课”“跟着总书记在浙江的足迹学党史”,组织听障学生开展“重走长征路”书画创作、手语讲党史活动,组织视障学生开展“无障碍学党史——红色观影”“百年芳华献给党——闻香学党史”活动,组织肢残学生开展“听党话、跟党走”宣誓活动,不断丰富信仰教育、感恩教育、自强教育、工匠精神等内容供给。手语“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MV登上学习强国、杭州地铁电视等公众平台,致敬百年风华,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学院党委着力打造心理健康工作从“被动干预”向“主动预防”“积极发展”转型,构建全方位、浸润式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体系。

课程思政融合,播撒积极心态种子。思政教育形式多维出彩,全国首创开设公选课《助残情怀》,开设《生命教育》《红色文化》特色公选课,将思政课与实践教学、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实现课程思政100%覆盖。

盖。有效发挥浙江省特殊教育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牵头作用,打造思政数字技术AI智课,创设“党史微电台”“艺起逐光”等“残健融合”思政育人特色平台,打造“思政课+红色场馆”等“行走的思政课”。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搭建心灵成长舞台。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每周开展两次“开放日”活动,组织特色团辅、沙盘体验、手工DIY等活动;开展“芳华悦己,向美而生”女生节活动,举办“关爱生命,共促健康”5·25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包括心理微课大赛、“乐韵润心,音悦微光”音乐团辅、“悦心漫游,趣享欢乐”心理游园会、“彩笔传情,画意释心”油画棒绘画体验等十余项活动,累计近千名学生参加了活动。而由学生党员发起的“阳光心语”互助小组,已成为朋辈支持、分享成长的温暖港湾。

立体提升心理教育工作效能。学院通过搭建特殊教育云、聋生智能本地转写AI词库引擎等内容供给,全国首创开设心理健康测试、新生入学体能测试、日常心理咨询、学业情况、到课率、图书借阅、志愿服务、体育锻炼等大数据信息,全面把握残疾学生的思想行为。

依据残疾病生心理程度、生理心理特征的个体“精准画像”,调整相应的课堂教学方式、意识形态引导方式,解决能力不可达、信息不对称、情况不全面、预警不及时等问题,打好面向残疾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仗”,提升残疾病生心理教育工作效能。

(作者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 社科论衡

# 文学输出的范式创新与路径拓展

■ 王迅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积极拓展文明交流互鉴新方法新路径,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文学是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浙江文学输出呈现出经典作品多语种覆盖、网络文学产业化等特征,在文学产品与数字平台的融合中凸显了浙江特色。在文化强省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创新浙江文学输出的范式,拓展浙江文学输出的路径。

## 高质量文学输出的重要意义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影响着该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地位,而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纷纷被译介到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些作品里,国内与国外、传统与现代是共生的。文学输出成功的作家往往善于把外国文学资源融入本土文化书写,这种融合基于创作主体自觉的国际意识。在文明互动机制中,如何在世界性语境里处理中国经验,如何在多样文明融合中讲好中国故事,关乎文化自信的命题,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高质量文学输出的重点是海外读者的接受程度。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桥梁。要推动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深度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精神共振,既有赖于文本本身,又不能离开宣传、交流与推广。其中借力出版机构参加国际书展,是

重要的推广模式。近日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艾伟、汤汤、钟求是、哲贵、鲁引弓、海飞、界愚、斯晓东、东君、草白、宝树等浙籍作家纷纷亮相,展现了浙江当代文学的成就与深厚底蕴。浙籍作家与汉学家进行充分交流与沟通,在中外比较视野中建构浙江文学的主体性。

## 文学输出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当前我国文学输出对策研究主要着眼于作品翻译和出版方面,往往对我国文学被海外读者接受的实际情况有所忽略。事实上,海外读者的态度及评价关系到文学输出的整体效果,是衡量作品译介与接受完成度的重要指标。在新时代,“读者端”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程度依然是判断文学输出质量的试金石。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当前文学输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译介的价值目标如何实现。作为文化输出的必要环节,文学译介与传播是文明互鉴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内容。那么,“翻译”应在多大程度上忠于原著呢?诚然,完全拘泥于原著可能造成接受的困难,但若过于迁就国外读者的“口味”,是否又会导致文化的负迁移。归根结底,症结在于如何实现文学输出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的转型。在当前文学译介中,目标语国家的文化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倘若不能充分考虑异国文化因素,将会影响海外读者的接受效果。

其次是作家在输出国的介入有待加强。从传播学来看,文学输出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文学高质量输出有赖于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作者端”与“读者端”的互动是影响文学

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作主体与媒介主体的互动,可以通过媒介对海外读者实施“干预”。有专家认为,媒介占据了文学环境的权力要塞与中心,成为制约者与掌控者。因此,报纸、海报和网络等媒介主体与创作主体的互动,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再次是缺少基于海外接受的文本对策研究。《解密》的成功输出表明,文本因吸收叙事资源而彰显出“世界性”。麦家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小说中获取灵感,打破间谍题材作为通俗文学标签的思维定式,为之辅以“纯文学”性质的修辞改造,形成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这种融合中外审美元素的尝试,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生动实践。这种联接中外叙事资源、突破审美壁垒的创作实践,为浙江文学的高质量输出提供了文本建构的方法论支持。

## 浙江文学实现高质量输出的建议

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的传播转型,是当代文学高质量输出的关键一环。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找寻文学输出的突破口,并在文化主体的自我确证中实现浙江文学的有效传播,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基于浙江文学创作现状及其海外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实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and 对策:

一是借助自身优势在中外美学资源融合中探索文学输出新路径与新方法。创作主体应打破影响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沟通的壁垒,并把地方经验的书写纳入世界文学体系,同时,在处理“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中